

笔述徽闻旧史

合肥的汽车记忆

□许春樵

漫话六山镜

□姚治中

A 如今,我们的居所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小区里的某个固定的门牌号码,汽车会把我们带往地图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并驻扎下来。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的朋友告诉我,许多有车一族晚上是睡在自己的小汽车里的,这时候,汽车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安全的临时居所。

前些天,我去4S店刚刚为自己的车做了首保。这是我的第二辆车,审美疲劳使我无法对这锃亮的钢铁造型找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定义,想来想去,汽车相当于十多年前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一台空调,一个大哥大,再往前一二十年,就是一台电风扇,或老家乡下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现在,如果上午九点从合肥站上动车,两个小时就到武汉了。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合肥一家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收拾好行李后,早上六点半从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上了公共汽车,到合肥已是晚上九点多,足足开了十五个多小时,汽车途经湖北英山、河南信阳、固始,由霍邱进入安徽境内。天很热,残破的公共汽车里没有空调,比车更破的道路上扬起源源不断的灰尘卷进车窗内,人窒息得半死。在大西门三里庵附近一处两边生长着蔬菜的路边下车后,我拎着一卷简单的行李要去投奔在这里工作的弟弟,可半个多小时没等到一辆公交车,偶尔有行人路过,都说这里有些偏,没车了,后来在寥落而暗淡的灯光下过来了一辆摩托车,问去绩溪县省外住宿舍二区多少钱,摩托车手说:四块,不还价!

坐公交只要两毛,二十倍的天价。已是夜里十点

B 可买摩托车的痴心妄想也很快就熄灭了。我的工资加编辑费每月有两百多,而一般单位只有一百多。我拿着两百多高薪还是买不起摩托车,普通踏板“铃木”50轻骑要六千多,好一点的摩托要一万多,所以我在合肥前两年置办的最贵重的家产就是四百八十多块钱一辆的变速自行车,三个月后被偷,其痛苦的情形可想而知。一段时间里,只要见了街上相同的自行车,总觉得那是我偷的车,总想拽住盘问审查购车发票。这种感觉很不真实,于是花八十多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报社印刷厂在遥远的姚公庙,编校合一的我们统一打黄面的去印刷厂校对,一些兄弟报社的同仁们会羡慕地说:还是你们有钱,坐出租车去校对,太牛了!

在全民骑自行车的时代,坐汽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在合肥打黄面的是相当体面的,能坐上黄面的跟如今坐上“奔驰”、“宝马”的表情是一样的,经常在酒店门口见到头发漂亮的暴发户从安全系数较低的黄面的里跳下来,神情很优越,他们在酒桌上也会有意无意地说:“车太难打了!”说这话强调的不是车难打,而是打车这件事。其实那时候车并不难打,不是车多,而是打不起。如果打一次黄面的花去八块钱的话,等于损失了十来碗面条,二十多斤砒山梨,三十几个土鸡蛋。

一个飘着细雪的周末,我和报社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到肥东的一个朋友家喝酒,喝完酒已是漫天大雪,路太滑,车闸失灵,回来的路上,几个人前仆后继地摔倒在地,倒地后还在地上赖上一会,以恢复筋骨。好在那年月路

C 如今,汽车已走下神坛,高贵的意义也被消解,同时被损耗掉的还有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我居住的小区里一位批发烟酒的小伙子买了一辆“凯越”,他说平时自己玩,偶尔给租赁公司出租,一年能挣回两三万,乡下表侄在百脑汇电脑城租了一个摊位,那天电话里听说我要从北戴河回来,他主动问我:要不要我开车去车站接你?我问什么车,他说是红色“铃木”雨燕,我说你爸爸在乡下开手扶拖拉机,你都开上小汽车了。他谦虚地说:如今城里小汽车跟乡下拖拉机是一样的。

整个合肥都在堵车,金寨路高架和南一环交口白天就像一个失控的停车场,上下左右、从早到晚全是车,面



多,公交早停了,自行车都很少见,又饿又累的我,一咬牙,任宰了。

那一刻,我最尖锐的感受是: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鬼地方读书?将来有朝一日,要是时来运转能发财,一定要买一辆摩托车。

那一刻,再天才的想像力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买汽车。

上汽车很少加上夜深人静,所以不存在死于非命的危险。记得回到宿舍已是十二点多钟。第二天在报社办公室里,我反省这件事时总结说:我们应该合伙打面的回来,将自行车放在面的后面。有同事说:一辆面的不够,两辆太浪费。从肥东到合肥打车每辆二十块钱,雪天二十五。一个酒没完全清醒的同事说:什么时候我自己买一辆汽车开着出去喝酒。办公室里所有人也包括我,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就都笑了起来。

汽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一辆普通的“尼桑”、“蓝鸟”轿车在当时的合肥值两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再好一点的车,如高配的“凌志”、“别克”、“奥迪”等就可以盖一幢普通的宿舍楼和两所希望小学。所以说领导干部屁股下面坐一幢楼一点都不夸张。在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一代人中,当官除了为人民服务外,很大程度上是能坐上专用的小汽车。多少官场弟兄为了能熬到配上小汽车的级别和职务,头发大面积脱落,心血如啤酒一样被岁月耗尽。一九九四年我被组织上任到一家出版社任副社长,社里有好几辆汽车,其中一辆“丰田”面包和“三菱”轿车最初我是常用的,出行行走,以汽车代步,不少同学都眼红,说我终于享受腐败了。回来一想,我也就真的觉得此事很严重,而且确有腐败嫌疑,于是除了公务,从不动用单位的车,平时上下班跟同事们一道骑自行车。动用公家汽车在我那时候的意识中,不是动用交通工具,而是动摇一种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许多年后,旧事重提,酒桌上又有同学说我那样做很滑稽很幽默。我哑口无言。其实,汽车的性质一直没变,而是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变了。

色苍茫的车主们手扶着失去了方向的方向盘,在遥遥无期的忍耐中等待突围……

看匍匐在拥挤马路上的一辆辆举步维艰的小汽车,看走投无路时因无意中违规而接受交警罚款的小汽车和驾驶者,看小区里孤儿一样趴在路边、草坪、树下、墙角里的小汽车,你会觉得繁华都市里的小汽车,不仅不再高贵,甚至连基本的尊严也打了太多折扣。

时代就这样在你不经意之间悄悄地把高贵与卑贱、富有与贫穷、显赫与平淡、优越与庸常、伟大与渺小重新洗牌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汽车已经变成了手扶拖拉机。没有永远的高贵,也没有永远的卑微,汽车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投稿邮箱:zyq-405@163.com

近期六安城东战国楚墓中发现了一面六山铜镜,直径达27厘米,一些来访的朋友们都以兴奋的心情讨论它的珍贵。文物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六山镜的发现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皖西地区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弥足珍贵。

铜镜最早出现于中原,逐渐传向南方,战国时,江汉间及淮河流域成为最重要的铸镜基地。据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的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土楚镜达1000面左右,远超过其他诸侯国的(已出土的)铜镜(如西安仅出土战国铜镜5面,郑州仅2面)。其中湖南长沙出土楚国铜镜即达470多面。皖西地区,寿县在解放前就出土多面楚镜,六安市区,除发现楚镜外,还发现多面西汉铜镜,这次又出土了全国罕见的六山楚镜,一系列发现,从又一角度佐证了皖西地区作为晚楚时期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山字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纹饰也越来越多样、繁复、细致,尺寸也越来越大。到了西汉,更出现了多达34字的铭文,有的还镌刻12地支的篆文,整体组合成天圆地方。从春秋到西汉,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当时人对铜镜的认识更加成熟,铜镜的功能,绝对不止是照出容貌,梳妆打扮了。

霍山籍学者程如峰先生以为山字形纹饰是中山国(今河北)首创,山字纹铜镜是楚人向中山国学习来的。这个推测尚没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可能有助于我们破解这个谜团。

就从山字着手。反映周秦文字的《尔雅》说:“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仙又与“仝”通,东汉辞书《说文解字》:“仝,人在山上也。”引申为修道之人从山巅腾云驾雾飞上九霄的形象。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曾派人到海中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据说那里有众多的仙人及长生不老药。山是天地相通的捷径,从战国诸侯王到秦始皇、汉武帝都向往的。所以淮南王刘安升天要选择八公山,与刘安同时的司马相如见到“列仙之儒居山泽间。”苦苦寻觅,为了成仙,都离不开山。

古人不懂光的反射或折射。认为人的精神能够离开肉体而存在与活动,铜镜中的反射就是人的灵魂,照镜子就可看到自己的灵魂。镜子在古人眼中,不仅是梳妆工具,更是沟通灵魂与肉体的工具,沟通灵魂所在的天庭与肉体所在的人间的桥梁。它的作用与地位,就如山一样,至少,当时人们使用镜子,是希望镜子如山那样,使自己更接近灵魂所栖息的那个神仙世界,楚镜中山字纹饰的流行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楚时的山字镜,朦胧地反映出楚人的神仙思想及向往的神仙境界。春秋到西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寿春及其周围地区,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上承春秋战国对神山的向往,下启西汉修炼神仙术之盛行,汉武帝也不例外。寿春及附近地区大批山字镜的出土,特别是罕见的六山镜的出土,凸显了皖西地区晚楚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皖西地区发现的汉镜则以实物证明了楚文化在皖西的传承与发展。

从春秋战国之交的素面镜,战国中后期的山字镜,到西汉的铭文镜,清楚地反映了楚汉时期,古人神仙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楚文化(或楚史)成为一门学问始于皖西的考古发现,楚式镜发现的最早地区在淮河流域,一度被称为“淮式镜”,只是后来湖南、湖北发现了更多的楚镜,楚文化的风格开始为学界所明确,才统称为楚式镜。楚镜的典型风格即是山字纹,多年来为学界关注而未得破解。汉镜继承并发展了楚镜的风格,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从汉人神仙思想中关于“山”与神仙世界的深层次内涵,可以窥见铜镜中的山字纹,不仅仅是一个山字那么简单,它凝聚了楚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理解与追求,上承春秋战国,下启西汉,是古人修道成仙思想中“神山向往”的标志性艺术形象。

